

3703 0072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



社会主义：历史和哲学的论证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的新认识

都本伟 回春茹

辽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1991年7月

社会主义：历史和哲学的论证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的新认识

都本伟 回春茹

内 容 提 要

对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的认识，以往的文章大多从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而较少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出发；谈历史必然性、规律性较多，谈人的历史主动性、选择性较少；谈前进性较多，谈曲折性较少。本文试图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的统一方面，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共同作用的产物。揭示了这种寓于特殊之中的历史普遍性；从历史必然性和历史主动性的统一方面，阐述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和历史主体能动性相结合的产物，分析了50年代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建立在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充分认识和正确分析的基础之上的，是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积极改造社会的成果，揭示了这种建立在必然之上的历史创造性；从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和前进性的统一方面，正视了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所出现的困难、挫折和失误，分析了出现困难、挫折和失误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阐明了社会主义的发展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揭示了这种历史前进过程中的曲折性。本文试图遵循逻辑和历史统一的原则，以史为经，以论为纬，重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并尝试通过逻辑的形式来把握这一历史过程的本质。

“一石激起千层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震醒了沉睡的东方古国。在10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1921年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1949年10月赢得了独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40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我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过去，由于指导思想和决策上的某些失误以及多种原因造成，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曾经出现过困难和挫折，也曾经出现过经济停滞和政治动乱。对此，国际反动势力污蔑“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失败”，国内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攻击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失误，主张倒回去搞资本主义。究竟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是历史的误会还是历史的必然，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符合了社会发展的规律还是违背了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如何？就成了摆在我们中国共产党

人面前迫切需要回答的尖锐问题。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主观随意和盲目性的选择，而是世界历史的发展和中国特殊的经济政治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是历史的必然。这一历史性地选择，体现了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统一，历史必然性和历史主动性的统一，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和前进性的统一，经过70多年的革命和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一、从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统一看： 社会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必然产物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的体现。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是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分析出的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不同阶段向前发展的一般规律。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情况，揭示了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指出了落后国家有可能不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发展进程。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和规律，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武装夺取政权，建立工农联盟和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道路。因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不一定按照“五种社会形态”逐级上升，而是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这是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的。

回顾世界近代史，西方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在最主要的经济发达国家（英、法、德等）都相继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巩固和发展，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转变。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扩大了海外贸易，随着商品输出、资本输出的扩大，许多国家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宗主国和殖民地。资产阶级从这些国家疯狂掠夺廉价原料和劳动力，倾销过剩商品，使世界各国逐渐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联系了起来。无论是封建制的、奴隶制的，甚至是处于原始社会的民族都无法再闭关自守、自给自足，各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已不再是地域性的、偶发性的，而是全球性的、必然性的。资本主义世界性交往的发展，把许多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也一同卷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因而，近代史开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破坏了旧时经济体系的孤立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因而也破坏了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狭隘性），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联结成统一的经济整体。”

“世界史”的形成，使东方落后国家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国门，被强行纳入世界交往的大潮，成为世界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开始生长着新的社会因素。但是，资本主义的

入侵，也使这些国家丧失了民族独立，堵住了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如果没有形成世界历史，各民族孤立发展，那么，落后民族和国家，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经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之后，才能走向更高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这是马克思原来的设想。但是，本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世界历史”，使得落后的民族和国家不再“脱离现代世界而孤立生存”，成为和资本主义“同时代的东西”，这就为落后民族和国家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发展，而又吸取它的一切积极成果，走向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形态，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由此，马克思在其晚年转向人类学的研究，在他看到了包括俄国土地制度在内的大量东方社会的资料，进一步认识到落后的东方社会被资本主义强行纳入世界历史体系的变化之后，提出了象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走向公有制社会。

世界历史的形成，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一方面使各民族摆脱了民族局限和地域限制，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发生直接联系，各民族的发展无需沿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从头开始，而是可以在高起点上直接利用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通过世界市场的建立，剥削和奴役落后国家的人民，缓和了本国的阶级矛盾，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矛盾成了世界诸种矛盾的焦点。这种主要矛盾的转移，使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同国际资产阶级的矛盾加剧，在一定程度上为东方落后国家摆脱国际资本主义的殖民统治，走向独立和富强之路，创造了条件。

东方落后国家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不是对历史一般规律的违背，而是对历史一般规律的丰富。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不仅要从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贫困及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作为自己的国内生存条件，而且要从国际上其他民族丧失独立主权，沦为它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为其提供国外市场和廉价原料与劳动力，作为国际生存条件。资本主义取得了国际生存条件后，却产生了与自己主观愿望相反的结果，即同时又在国际上给自己造成了掘墓人，促使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起来反对自己，造成了民族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得以发生的主客观条件：

这些国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先天不足。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是血与火的历史，资本来到人间，每个毛孔都沾着肮脏的东西，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靠圈地运动和殖民掠夺，但是东方落后国家宗法关系和农村公社组织的存在，以及自给自足小生产方式的强大影响，不可能以有组织的暴力加速完成农民和土地的分离，无法使农村大量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造就大批的雇佣工人，这意味着不可能造就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内社会条件。

这些国家，由于国际资本的侵入，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落后的封建主义经济仍严重存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物质生活资料贫乏，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各种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社会上滚动着革命的岩浆，极易一触即发。在这些国家，同经济落后相联系的是政治制度极为反动，国内统治阶级与国外资本主义相互勾结，人民没有合法的斗争权力，不能通过合理的途径和渠道，提出自己的要求，保护自己的利益，因而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才能获得自己的独立和解放。

由于这些国家资本主义未得到充分发展，封建的甚至是奴隶的所有制关系大量存在，因而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农民或奴隶阶级。农民没有生产资料，租种土地遭受封建剥削严重，从农民中分化出来的产业工人受着本国和外国资本的双重压榨，容易接受革命思想，希望推翻旧制度。这些国家的小资产阶级的发展也受着国外资本的限制和本国大资产阶级的盘剥，因而也存在着革命因素。特别是在这些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处于与资本主义矛盾的中心，极易成为革命的主导力量。

中国是东方落后的国家之一，落后国家以上这些政治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在中国社会表现的尤为突出。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进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古老的东方大国被纳入了世界经济的体系。但中国除了具有与其他落后国家相同的一般政治经济条件，受一般的历史发展规律制约外，还有它本身的个性特征和特殊的发展规律，只有从中国社会的特殊矛盾运动中，才能获得中国为什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认识，才能揭示寓于特殊之中的历史普遍性。

19世纪40年代，中国在资本主义列强“坚船炮利”的蹂躏下，被迫结束原来的闭关自守状态，丧失了独立自主。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与他们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平分秋色，而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为其效劳和利用。因此，它们侵入中国后，就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大力扶植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种官僚资本同外国垄断资本和封建所有制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成为中国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要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就必须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即不仅要打倒封建主义，而且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但是，这种革命要求并没有被当时的人们所充分认识到。虽然当时已经有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寻求救国救民之路。有的想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实行改良（康梁变法）；有的尝试用革命的手段，自上而下地推翻封建王朝（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向往的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出现，革命的结果，不是被颠覆，就是被军阀篡权，中国仍然是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因此，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解决民族革命的问题，即“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④这样，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就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解决这一主要矛盾，需要有解决这一矛盾的革命力量。那么，当时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谁能承担起这一历史任务呢？

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产生，但是它的产生并不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逐步发展的产物，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并破坏了中国原有的经济结构的基础上被催生出来的。它一出生就受到外国资本的排挤，受到封建关系的束缚和官僚军阀政府的压榨。由于它对外国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有很大的依赖性，不敢彻底地反帝反官僚。并且由于他们之中有些是从地主转化过来的，与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有密切的关系，也不敢彻底地反封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上的这种软弱性，也就决定了即使他们掌

握了国家政权，也无力摆脱外国资本的控制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束缚，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辛亥革命的失败，就是明显的例证。

中国的无产阶级是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而产生的。受压迫最深，革命性最强。中国经济落后，故工人阶级的人数在当时并不多，约有200万人，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①“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那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

中国的农民阶级虽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但他们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害和封建压迫之苦，他们的人数众多，但拥有的土地少，有的甚至没有土地，受着封建地主的剥削，地位低下，“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②。由于中国无产阶级人数少，没有农民这个最广大最基层的群众参加，就不能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目的，而中国社会阶级的特殊性就在于无产阶级与广大农民有着天然联系，最容易和农民结成联盟。

显而易见，以上各阶级中只有中国无产阶级才能承担起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给了中国无产阶级以极大的启发，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受到了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开始认真学习和传播马列主义，研究苏联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经验。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中国的先进分子建立了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俄国人的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相结合，用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方法，与中国的反动阶级和帝国主义展开了英勇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经过“过渡时期”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由此可见，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是某些人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现代世界历史发展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客观条件促使中国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觉醒的必然产物。

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告诉人们：“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③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所表现出的特殊性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因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发展形式和顺序上的特殊性是相互联系的，而且是以后者为基础的。马克思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形态发展的一般进程（中国也经历了其中四个发展阶段），但它并不是历史发展的绝对规律。现代世界的历史发展表明，并不是每一个民族，都按顺序经过这些阶段而走向更高的社会形态。由于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任务，在中国只能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来完成。中国越过资本主义社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既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中国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中国人民革命的必然产物，遵循着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

二、从历史必然性与历史主动性的统一看：由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

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历史必由之路，又是历史发展客观必然和人们主观努力相结合的产物。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的不同，在于社会规律需要人的参与，社会规律在人类历史中的体现要通过人的活动来实现，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历史发展中表现为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对客观进程起促进或促退作用。人们的主观认识与行动若能更早地、更切实际地符合客观规律，就能加速历史发展的进程；人们的主观认识和行动不能及时地反映历史规律，不能准确地抓住历史时机，创造完成历史任务的条件，就会延缓历史发展的进程。因而历史规律给人们提供了一条客观的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但历史规律的实现，则取决于人的自觉活动，落后的社会制度，需要人来推翻，先进的社会制度，需要人来选择和设计。如果看不到人的活动的这种历史主动性，就不能解释为何有些取得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而中国却在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对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将向什么方向发展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作了预测，他说：“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⑤同时又认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需要有一个“过渡形式”，经历一个“过渡时期”。

那么，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后，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其目的是要通过解决这一矛盾最终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大敌人在中国的统治，大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也是这一革命的对象。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曾经作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参加到反帝反封建的行列中。所以，民主革命，不但是有利于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广大劳动群众的，同时也是有利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直接目标是为了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在中国建立起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这个社会，一方面为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扫清道路，有利于其发展；另一方面，又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形成，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途。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后，将面临着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两种抉择。革命胜利后，虽然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但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占有相当的比重。1949年，资本主义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63.2%，到1952年还占32.7%，私营商业在1950年占全国商业机构批发额的76%，零售额的85%。1952年，包括批发额、零售额在内的私营商业还占到48%。在农村中，小农经济是一片汪洋大海，尽管1952年有40%的农户参加了互助组合作

社，但这些互助合作社主要还是私有制性质的。（资料来源：1990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当时主要存在着三种经济成分，即社会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同这三种基本经济成分相适应的是三种基本的阶级力量，即工人、农民和资产阶级。这三种经济成分，三种阶级力量，又主要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既然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两种社会发展方向的可能，那么，中国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而抵制资本主义呢？这是由于：第一，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不仅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且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剥削阶级。资本主义是一种剥削制度，搞资本主义就意味着无产阶级重新受剥削，是不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因而走回头路是无产阶级绝不希望的。第二，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历来受外国资本的制约，独立以后的中国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工业就自然不能摆脱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中国就难免成为外国垄断资本的加工厂和原料、劳动力的供给地，中国就会逐渐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第三，资本主义经济得以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一是要有大量人身自由，但丧失了任何生产资料的无产者的存在，这是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因为革命的目的是要大多数人占有生产资料，把大多数人刚刚占有的生产资料拱手让给少数资产阶级，是违背人民意志的；二是需要有大量货币资本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以便用来进行原始积累。在中国的条件下，积累资本不能靠掠夺和侵略扩张，只有靠加紧剥削工人和使小生产者破产，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样做纯粹是自我摧残。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唯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及时地向社会主义过渡，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但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无产阶级牢牢掌握国家政权，因为只有人民手中掌握着强大的国家机器，才不怕资产阶级造反；二是必须树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因为无产阶级只有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才能防止资产阶级利用手中掌握的经济实力抗拒社会主义改造。因此，革命胜利之后，在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但还没有完全掌握整个国民经济命脉的情况下，就必须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动性，系统地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和小农经济，全面地确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当时，我们党正是这样做的。

新中国成立前，资本主义经济主要部分操纵在官僚资产阶级手中，解放后，党和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并逐渐地把它变成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基本掌握了国家主要的经济命脉，这部分国营经济为日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的实施奠定了基础，它快速地集结和积累了工业化资本，把分散的资金、资源和经济力量集中起来，有利于国家投资，组织经济建设，促进国营经济的强大，在国际市场上对抗经济实力强大，技术先进的国际垄断资本。

新中国的成立，中国人民扬眉吐气，当家做了主人，焕发出了冲天的革命干劲和创造历史的主动性、积极性。地主资产阶级再也不敢为非作歹，农民们分得了土地，不再受地主的剥削，即使被民族资产阶级雇用的工人，也有了做人和争取自己利益的权利，民族资本家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剥削，反而他们的生产和经营却受着工人的监督和制约。因此，广大工人农民是拥护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随着现代国外垄断资本主义的入侵发展起来的后起工业，比较弱小、分散，设备陈旧，技术条件差，同我国国营经济之间存在着矛盾，企业内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存在矛盾。依靠这样脆弱的工业基础，要克服这些尖锐矛盾，沿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中国的经济是不可能起飞的。在我国农业个体经济中，广大农民生产工具落后和严重不足，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农业规模狭小，资金极度缺乏，不利于农田基本建设，改良土壤，更新农具，机耕土地，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扩大再生产更是不可能，因此更需要组织起来，靠集体的力量发展农业经济。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际资本主义的封锁、禁运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必须要有强大的工业、军事力量和国际援助。当时中国极度缺乏搞经济建设的经验、人才、资金、技术设备等等，必须向外国学习求援，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强国没有也不可能提供这些援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有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靠近，选择社会主义阵营，而不可能选择资本主义阵营。

从这些情况来看，在50年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国情的，是客观历史发展规律的要求，因而是正确的。这种选择的正确性就在于它是建立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充分认识和正确分析的基础上，没有这种科学的认识，我们在实践中就会走弯路，社会发展的进程就会缓慢。事实上，与我国的国情大致相似，而在国家独立后走向资本主义的国家（例如印度），无论是从经济建设、政权建设，人民生活的提高等各方面都大大地落在了中国的后头，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历史观，也为中国的这一正确选择，提供了理论基础。它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一定性质和水平的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也是有一定范围的。如在以金属手工工具为标志的生产力基础上，奴隶制、封建制甚至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都曾经并存过；在现代以大机器生产为标志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也存在着性质不同的各类所有制关系。这说明，在一种生产力基础上，有时可能容纳不止一种生产关系形式。诚然，先进的生产关系总是要代替落后的生产关系的，这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但是，这种代替却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人们在历史活动中主动选择和创造的结果。在中国如果选择资本主义道路，如前述只能给人民带来许多困难，养肥一个资产阶级；而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调动起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使多数人过上幸福生活。在两种可能性面前，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主动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说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规律和党的正确选择的高度统一。不仅如此，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后所采取的具体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也是一种基于特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民族特点的选择，而不存在着预成的单一的模式。可是，我们在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却放弃了这种选择的历史主动性，而照搬苏联的模式，不从国情出发，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但经过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积累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又重新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选择，大胆地进行全面改革，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使社会主义建设在近年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三、从历史发展的曲折性与前进性的统一看： 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光明前途

既然社会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建设的正确选择，那么，为什么中国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久，却出现了58年的“大跃进”和10年“文化大革命”那样深重的灾难，使国民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对外开放，学习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式，采用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我们过去对社会主义的选择还对不对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上，进步认识。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一切顺应历史潮流而产生的新生事物，都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和远大的前途，最终必然战胜和代替旧事物，把事物推进到更高的发展阶段。但是任何事物的成长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必然要经历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不成熟到成熟、由不完善到完善的矛盾运动过程。在此过程中，曲折、失误，以至暂时的倒退，是难以避免的。任何社会的发展总是曲折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而不是平坦的、笔直的。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是这样，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也是这样。例如，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于1640年，中经1660年的王朝复辟，直到1688年，英国的资产阶级专政才稳固下来。中国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是1915年到1917年不到两年的时间，袁世凯和张勋就搞了两次复辟。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更是艰难，经历了28年的曲折过程，这期间有失败和痛苦（如27年大革命的失败，34年反围剿的失败），也有胜利和欢乐（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何况，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是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过程，它比任何一种剥削制度取代另一种剥削制度的变革都要深刻，任务都要艰巨。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更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受挫折。

从我国40多年的建设过程来看，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从国民党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烂摊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整个国民经济崩溃；50年代美国发动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的越南战争以及对我国的长期经济技术封锁，给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极大困难。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同情我们，而有能力帮助我们的只有苏联。这样一些情况，不能不对我们的认识和做法产生影响，并逼迫我们采取针对性措施。所以，我们在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出现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了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不适当当地搬用了苏联的经济模式，违背了某些经济规律。加之我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它超越了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因而其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落后的情况更加突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对党和国家干部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和侵蚀，产生了某些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不正之风，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妨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正常发展。特别是人们急于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的强烈愿望，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受诸种条件制约的现实，常常发生矛盾，这就使得它在发展过程中显现出较明显的曲折迂回性。更严重的是由于我们党从革命转入建设，思想准备不足，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不足，搞经济建设的经验不足，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决策上曾出现了失误和犯了错误，

影响了社会主义的进程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能充分发挥出来。

社会主义在实践过程中所发生的失误和错误，有其客观的原因和主观的原因，或者是由于国际国内的不利环境造成的，或者是由于旧制度的影响造成的，或者是主观指导上违背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规律造成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但即使走了许多弯路，犯了许多错误，但中国40余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从总的趋势上看，是前进的上升的。由于消灭了剥削和压迫制度，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劳动人民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实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我国人民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形成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从而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因而，无论从经济建设还是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改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的成就。如旧中国从洋务运动开始到1949年的80余年积累的工业固定资产总值仅124亿元，而从新中国成立到1988年，靠着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总值已达10641亿元，增长了80多倍，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解放前居世界第40几位上升到1988年的第8位。中国的粮食、棉花、钢铁、煤炭、电力、水泥、化肥等主要产品产量已跃居世界前列，有的居于世界首位。中国已经建立起了独立的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在航天技术、核技术、计算机技术、生物工程、农业科学等高科技领域的某些方面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提高，据统计，1989年已列居世界第6位（资料来源：1990年7月2日《人民日报》）。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符合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敢于正视失误，修正错误，实事求是的执政党，因此，在对过去的失误和错误有了共同认识，吸取了经验教训之后，也能够及时纠正。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针对自己体制中的缺陷和弊病，大胆进行改革，使近几十年成为建国以来失误最少，人民得到的实惠最多，国家实力增长最快的时期。

以上事实说明，我国社会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既出现过曲折、失误，但总的方向是前进的、上升的，成就是巨大的。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是由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决定的，这一规律是不可改变的，但代替的过程却是长期的，曲折的。当然曲折性也会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带来危害和损失，在一定程度上会延缓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因此，我们必须十分重视社会主义发展中出现的曲折和困难，并力图做到少出现曲折和困难，出现了曲折和困难后，应及时研究对策，调整方针，努力克服困难和曲折。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出现过困难和曲折，但通过改革，是能够自我更新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未来前途是光明的。

注释：

- ①《列宁选集》第1卷，第188页。
-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8页。
- 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91页。
- ④《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50页。
- ⑤《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页。
- 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页。
- ⑦《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页。
- ⑧《列宁选集》第4卷，第690页。
- 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27页。